



古人面对以木构建筑为主的居住环境,已发展出严密的消防意识与体系,其中宋代的消防体制机制尤为突出,从《武林旧事》《梦粱录》等宋朝笔记到《西湖清趣图》中的细微描画,可以一窥当年市政工程的严密:不论是消防望火楼,还是河渠护栏,都颇具市政智慧。

【短史记】

# 宋代如何打造『水火防线』

□孙晓明

从《武林旧事》《梦粱录》等宋朝笔记林林总总的记录中,能看到宋代为满足都城居民生活之需而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。而从《西湖清趣图》(又称《西湖全景图》)中,可窥见南宋杭州的消防设施。

《西湖清趣图》的主图长达16米,从钱塘门绘起,逆时针绕西湖一圈,再回到钱塘门,环360度描绘了南宋西湖全景。虽然有质疑此图为清人所作,不过学者亦认为,即便不是宋人所绘,也一定有宋朝粉本供临摹,因为后世的画家单凭想象,是不可能将南宋西湖景观描绘得如此“押韵合辙”。特别是作为图像史料,与文字史料相互佐证,互为补充,让今人可以了解南宋都城消防设施的全貌和启动应对机制。

这幅《西湖清趣图》中,在钱塘门外左边的高处,画家绘出一座高耸的塔状建筑物。钱湖门与清波门之间、清波门与涌金门之间的城内山坡上,也各有一座类似的建筑。这是望火楼,是当时城市消防设施之一。

南宋时,临安的街道每隔二百余步,即设一个消防站,叫“军巡铺”,每铺布置巡逻兵三至五人,“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”。同时,宋廷又将杭州城内外划分成二十三个消防区,叫作“隅”,各隅分别配备消防人员一百至数百员,叫“潜火兵”;每隅又建望火楼一座,日夜派人瞭望,一旦发现烟火立即拉响警报,驻守该隅的潜火兵马上出动灭火。宋代的其他城市也配备有消防队,如建康、会稽、泉州、静江等州府,均有潜火队。《西湖清趣图》所绘出的,当是“钱塘隅”、钱湖门“城西隅”等处的望火

楼。

按宋朝的国家工程建设标准《营造法式》,望火楼由砖石结构的台基、四根巨木柱与顶端的望亭三部分组成,台基高十尺,木柱高三十尺,望亭高约八尺,整座望火楼高约四十八尺,接近16米。不过《西湖清趣图》中的钱塘隅望火楼,看起来并非由四根巨木构成,而是更牢固的砖砌结构。

很多人并不知道,宋代已经出现了专职、专业的消防队。宋朝潜火队的常用设备是“大小桶、洒子、麻搭、斧锯、梯子、火叉、大索、铁猫儿”,宋时尚无太高的高层建筑,望火楼自然不需要特别高。同时,宋朝的潜火队是由专职、专业的消防人员组成,潜火兵平日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。

南宋杭州的望火楼以敲锣为火警警报,同时以旗为号(夜晚改以灯为号),指明失火方位。宋廷先将杭州城内外划成几个防火警报区,并进行编码,比如,朝天门内的区域代码是三,朝天门外的区域代码是二,城外的区域代码是一,消防警报拉响后,潜火兵根据望火楼打出的旗帜(或灯笼)数目与方向,便可立即判断出失火的方位,争取第一时间出动救火。

俗话说“水火无情”,火灾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,同样河渠塘堰、城市内涝也可能吞噬人的生命。北宋东京,汴河穿城而过,是京师的生命线,供应京师的物资全赖汴河运输,但“汴水湍急,失足者随流而下,不可复活”。汴河岸“旧有短垣,以限往来,久而倾圯”,因此才时常发生失足坠河事故,这就要求管理方将修建沿河护栏纳入市政工程。

元祐年间,一位叫作方达源的御史“建言乞重修短垣,护其堤岸”。方达源的奏疏,不但

建议朝廷“重修短垣”,还阐发了应当保护每一名国民之生命安全的执政理念:“臣闻为治先务,在于求民疾苦,与之防患去害。至于一夫不获,若已推而纳于沟中……顷年并流筑短墙为之限隔,以防行人足跌、乘马惊逸之患,每数丈辄开小缺,以通舟人维缆之便,然后无殒溺之虞。”方达源的建议获得批准,“疏入报可,遂免滨溺之患”。由此可知,北宋东京的汴河岸不但修有堤坝,堤边还建有矮墙作为护栏,其日常维护则由“提举汴河堤岸司”与“都水监”两个部门负责。

南宋都城杭州的水网更为发达,元代时来过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描述说:“杭城‘街渠宽广,车船甚易往来,运载市民必需之食粮,人谓城中有大小桥梁一万二千座,然建于大渠而正对大道之桥拱甚高,船舶航行其下,可以不必下桅,而车马仍可经行桥上,盖其坡度适宜也’。然而,河渠若不设护栏,必有隐患,‘宋时城中沿河,旧无门限,惟居民门首,自为栏障,不相联属。河之转曲,两岸灯火相直,醉者夜行经过,如履平地,往往溺死,岁数十人’。”

元祐五年,苏轼任杭州知州,曾大规模整修市政工程。针对城内河渠未设护栏,河岸为居民占用的情况,苏轼放弃了全部拆迁违章建筑的计划,而是退一步,只要求占据河岸的民居腾出丈尺空间,“各作木岸,以护河堤”,同时“据所侵占地量出赁钱,官为桩管,准备修补木岸,乞免拆除屋舍”,即沿岸居民按照其占用的建筑面积缴纳租金,作为维修“木岸”的基金,政府则承认他们的物业,不再按违章建筑拆迁。苏轼主持修建的“木岸”,实际上就是沿着河岸设置护栏,“沿河连置大木阑,每船埠留一门,民始便之”。南宋时,一部分木制护栏又改建为更牢固的石砌围墙。

从《西湖清趣图》中,可以找到这样的矮墙护栏:出钱塘门,沿着城墙,西湖岸边形成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,街道一边是林立的酒店商铺,另一边就是石砌的矮墙,矮墙每隔一段距离,便开有一门,设置“上船亭”,以便居民出行登船或船舶靠岸。沿岸还植有垂柳,既美化环境,又可巩固堤岸。既防溺水等事故,又方便百姓出行。

◀《西湖清趣图》局部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## 鼓山石刻的墨韵雅集

□徐玉向

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,我踩着湿润的青石板拾级而上。山间的风裹挟着草木清香,越往上走,石阶两侧的摩崖石刻便愈发密集起来,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。

鼓山是东南名山,自古“粉丝”众多。从北宋起,无数文人墨客在鼓山千年古道、绝顶峰、灵源洞、达摩十八景等处留痕抒情。这些石刻内容丰富、形式多样、精品众多,有蔡襄、李纲、朱熹、赵汝愚等人手书真迹。福建鼓山的摩崖石刻,见证了千百年间文人墨客的才情与风雅,他们以山石为纸、以凿锤为笔,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宋庆历六年(1046年)蔡襄游览鼓山的题字,是鼓山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。整幅石刻高310厘米、宽190厘米,共24个字,分列4行,每行6字。细观这处题字,其字体为楷书,端重挺拔,“丙”竖“戍”撇欲左还。每一个笔画都苍劲有力,其转折处如同一座座山峰,突兀而又自然,展现出蔡襄书法的独特韵味。

据说,当时,蔡襄陪同朋友同游鼓山,他们被鼓山的秀丽景色所吸引,蔡襄兴致勃勃地在灵源洞前左侧道旁的岩壁上题下了“邵去华,苏才翁、郭世济、蔡君谟庆历丙戌孟秋八日游灵源洞”这24个字,不仅记录了蔡襄与友人同游鼓山的情景,也展现了他们对鼓山美景的喜爱。蔡襄的书法刚劲有力,字径达到了40厘米,给人以雄浑大气之感。

“喝水岩”三字为宋嘉祐六年(1061年)施元长所题。相传,当时有一位名叫神晏的法师在此诵经修行。然而,洞下的泉水却喧哗不止,影响了法师诵经。为了能够更好地修行,神晏法师便大喝一声止住了流水。令人惊讶的是,从此之后涧水竟然改道东流,而这里的溪涧也逐渐干涸。这个传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探寻。有些游客知道这个典故后,便站在石刻下效仿。或许这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,又或许因为时间的流转山水早已变换了模样。倘若他们看到“无水亦佳”的题刻后,又不知做何感想了。

登山古道上的更衣

亭东侧南向,还有一处楷书诗刻:“摄展来时草木新,看山宜我少年人。流泉声与闲云意,教悔灵源晚问津……”这方石刻来自一个十岁的孩子,他叫潘焘,是鼓山摩崖石刻中题者年龄最小的。看到这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,原来对艺术的热爱和表达是不分年龄的。

达摩十八景更是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。那形态各异的岩石,在古人的妙笔之下仿佛都被赋予了生命。它们或如达摩祖师静思悟禅,或如仙人指路,引领观者走进神秘的艺术世界。在这里,每一处石刻都蕴含着一个故事。

著名理学家朱熹也曾曾在鼓山留下珍贵石刻。相传朱熹多次到福州讲学,与知州赵汝愚相交甚厚。一次,朱熹到福州拜会赵汝愚,没想到他已到四川。于是,朱熹来到赵汝愚建的鼓山云亭留下题刻。三年后,赵汝愚再次入闽,看见题刻深为感慨,也留下诗刻。后来,朱熹再临鼓山被赵汝愚诗作感动,在绝顶峰石崖上镌刻“天风海涛”。

当我来到灵源洞前的蹴鳌桥下时,发现这里挤满了拍照的人。大家都想在“寿”字前留下自己的身影,导致十分拥挤。看到这种情况,有人提议让年纪大的游客先拍照,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。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家人搀扶下,慢慢地走到“寿”字前,微笑着留下了自己的照片。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力量,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于人们的善良和关爱,更来自于鼓山石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。

鼓山的摩崖石刻总数达712段,现存653段、佚刻59段。这些石刻内容丰富多样,涵盖了诗词、警句、名言等各种题材。有的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美,有的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悟,有的则记录了一段历史事件。形式上,既有楷书、行书、草书等各种字体,也有阴刻、阳刻等不同的雕刻手法。每一种形式都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。这些摩崖石刻堪称“完整的书法石刻艺术宝库”。当我们凝视着这些石刻时,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古人进行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
人文投稿邮箱:qlwbxujing@sina.com